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宋前文獻引《春秋》研究

郜同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前文獻引《春秋》研究

郢同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前文獻引《春秋》研究/郜同麟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61-6023-7

I. ①宋… II. ①郜… III. ①中國歷史—春秋時代—編年體
②《春秋》—研究 IV. ①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80198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郭曉鴻
特約編輯 李 英
責任校對 朱妍潔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址 <http://www.csspw.cn>
發行部 010-84083685
門市部 010-84029450
經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710×1000 1/16
印張 26.5
插頁 2
字數 448 千字
定價 86.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 例

一、現存的宋前文獻有數百種，前人又輯得宋前佚書百餘種，但多數文獻中提到《春秋》經傳的內容較少。本書用來輯錄《春秋》引文的文獻主要為第二章第一節中所述的五十餘種文獻，這五十餘種文獻中的《春秋》引文已佔宋前文獻中《春秋》引文的絕大多數，且在思想史、語言學和文獻學方面都有相當的代表性。另外，本書對其他文獻也稍有涉及。

二、為節省篇幅，本書對常用的直接引文一般以上標的形式標注出處，上標第一項為該文獻在文後所附《徵引文獻》中的序號，第二項為頁碼；對於引用到部分觀點或間接引用的文獻以頁下注的形式注明。

三、本書所引用的《春秋》經傳注，在沒有特殊說明的情況下，均引自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為省繁冗，本書不再一一標注出處。

四、所引文獻如果存在訛誤情況，本書一般在訛字後以括號注出本字。如果有因書頁殘損造成的闕字，一般以“□”代替。

五、本書對部分引文的標點作了修改，與原文不盡相同。

六、本書對一些常見的文獻使用簡稱，主要有：

《左傳》杜預注——杜注

《公羊傳》何休注——何注

《穀梁傳》范甯注——范注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勘記》

《七經孟子考文》——《考文》

《說文解字》——《說文》

《說文解字繫傳》——《繫傳》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段注

《經典釋文》——《釋文》

《太平御覽》——《御覽》

慧琳《一切經音義》——《慧琳音義》

玄應《一切經音義》——《玄應音義》

目 錄

凡例	(1)
第一章 概論	(1)
第一節 前人研究綜述	(1)
第二節 研究對象和研究意義	(5)
第二章 宋前文獻引《春秋》綜合研究	(10)
第一節 相關文獻叙錄	(10)
第二節 引文體例研究	(34)
第三章 《春秋》引文與學術思想史	(67)
第一節 《春秋》與先秦至漢初的思想史	(67)
第二節 《春秋》與漢代學術思想史	(79)
第三節 《春秋》大義應用實例	(144)
第四節 引文變異與學術思想的轉變	(153)
第四章 《春秋》引文與語言文字學	(159)
第一節 《春秋》異文與音韻學研究	(159)
第二節 《春秋》異文與詞義演變	(202)
第三節 《春秋》異文與語法變遷	(238)
第五章 《春秋》引文與古籍整理	(269)
第一節 《春秋》引文與校勘學	(269)

第二節 《春秋》引文與古籍校勘	(285)
第三節 《春秋》引文與古籍標點	(295)
第四節 《春秋》引文與輯佚	(305)
第五節 《春秋》引文與《春秋》經傳注整理	(379)
結語	(396)
徵引文獻	(398)
主要參考文獻	(408)
後記	(416)

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前人研究綜述

《春秋》經傳，包括《春秋》經和《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是極為重要的儒家文獻。它們對中國的哲學、史學、文學、政治學、法學等諸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春秋》經傳的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其中包括注譯、校勘、詞彙研究、語法研究、義例研究、義理闡發等多個方面。但對其他文獻引《春秋》經傳的研究却並不充分。《春秋》經傳作為重要的儒家經典，歷代都被廣泛徵引，用以考史實、作論據、釋字義等。這些引文對於《春秋》經傳的研究也有重大意義。本書對這些關於《春秋》經傳的引文材料進行了系統整理，並在相關的文獻學、語言文字學和學術史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清代漢學興盛，清儒們利用一切當時可以見到的材料來整理經書。清代關於《春秋》經傳的注疏，如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陳立《公羊義疏》等都利用了一些關於《春秋》經傳的引文材料。惠書一般只是利用古書中的引文出注異文。洪亮吉全以古書中引到的《左傳》舊注及與《左傳》相關的內容為說，除了用引文來注異文外，還用引文以釋經傳。劉文淇除了利用《校勘記》等前人已有的對《春秋》引文的研究外，還擴大了研究對象，利用了一些前人較少注意的文獻，如《通典》、《太平御覽》等書，用以校經、釋經。陳立蒐集了《漢書》、《春秋繁露》、《白虎通義》等漢代典籍

引用《公羊傳》的內容，用以釋《公羊》大義，他對《春秋》經傳引文的利用已超出異文研究和經傳注釋的範圍，進入義理研究的領域了。但這些注疏的研究本體仍是《春秋》經傳，引文材料不過是研究工具而已。

清代的學術筆記，如徐文靖《管城碩記》、趙翼《陔餘叢考》、王引之《經義述聞》、邵晉涵《南江札記》、俞樾《群經平議》、于鬯《香草校書》等，也都利用了一些引文材料。這些書雖然精義頗多，但它們的目的仍是校勘、注釋經傳，而非研究引文本身。

清代專門做異文研究的，有陳樹華《春秋經傳集解考正》、萬希槐《十三經證異》和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這三部書都以校正經傳文字為目的，蒐集文獻中引用《春秋》經傳的異文，以校勘經傳。三書中當以陳書為最早，可惜並無刻本，現存有盧文弨抄本，《續修四庫全書》即據之影印。陳樹華在《凡例》中說：“此書專訂譌字，定句讀，而音義之失亦間及之。”^{[14][頁16]}由此可見此書的旨趣。該書以版本校勘為主，旁及引文異文，異文之下多有考證。該書最大的特點在於不僅輯錄經傳異文，對其他文獻引《左傳》杜預注的異文也做了收集。阮元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於《左傳》一經多取材於該書。

萬希槐書，據其兄萬三峯之序，“乙亥來歸，自宜取其書流覽至竟”云云，則該書於嘉慶乙亥，即嘉慶十九年（1815）已撰成。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撰成於嘉慶十八年（1814），則兩書時代相當。不過萬書撰成後並沒有馬上得到刻印流傳，至1923年方由湖北官書局以活字印成。該書例言曰：“……不揣樸昧，摭拾群書，以昭同異。其字或通轉，或假借，或正字，或俗體，或古文，或今文，必求漢魏名儒之說，綴以所聞，更低一格，附於各條之後……《證異》引經語，上自周秦，下訖有唐。蓋唐以前藏書家皆寫本，其中文字異同皆有師授，讐校亦復精確。漢注唐疏及兩《漢書》注、《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可覆按也。自五代時，馮道作板本，宋初盛行，學者喜其書之易得，一以板本為主，而寫本浸以亡佚，踵謬承訛，無從是正。正不特宋儒改易經文，顛倒次序，為不可訓也。故是書一以唐為斷限。”由此可見，萬希槐作此書的目的是羅列、考證經書的文字異同，方法是蒐集唐以前注疏、類書中的異文。該書徵引極為繁富，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該書大多只是羅列異文，多數條目沒有考證或考證極簡略。其次，該書例言中雖號稱自注疏、類書無所不採，但實際上仍以經史注疏為主，於諸子、類書中的

材料利用較少，於經史注疏的材料也有不少遺漏。最後，該書為數不多的考證也頗有可商之處，如《左傳·隱公元年》“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萬希槐曰：“‘不及尸’、‘不及哀’，《荀子》、《說苑》皆作‘不及柩尸’、‘不及悲哀’。古本當如此。”^{[127][卷41頁4B]}實際上，《荀子》、《說苑》可能都是以當時口語化的雙音詞改《左傳》的單音詞，而非《左傳》本如此作。

清代做《春秋》經傳異文研究者，當以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最為詳贍，該書共十二卷，其中《左傳異文釋》十卷，《公羊傳異文釋》、《穀梁傳異文釋》各一卷。李氏在其自序中說：“三傳之文最為錯雜，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靡采諸家之文字音切，而未盡會通其誼。茲就掇竄之餘，見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槧本，校其異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襲乖舛，悉據古誼而疏證之。而前儒之論說，竝為蒐輯，使正其訛繆，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學者讀之，而經傳之異文亦可無惑於紛紛之岐說矣。”^{[16][頁1]}其自序雖說涉及了“宋元槧本”，但實際上仍以引書異文為主，版本不過偶一引用而已。該書雖然引書繁富，考證精詳，但也有一些問題。首先，該書對於多數異文僅考察異文之間的關係，而沒有注意到異文所在的上下文環境。如《左傳·隱公元年》“共叔段”，李富孫曰：“《潛夫論·志氏姓》作‘恭’。案《詩·韓奕》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是共為古借字。”^{[16][頁2]}“恭”、“共”古通，這自然是對的，但它們僅是在“恭敬”的意義上互通，而“共叔段”是由段出奔共而得名，“共”為地名。作為地名的“共”是否還可寫作“恭”可能還是有疑問的。汪繼培注《潛夫論》曰：“隱元年《左傳》‘共叔段’……疏云：‘賈、服以共為謚。’此作恭叔，義與賈、服同。”^{[117][頁450]}汪氏考證出《潛夫論》作“恭”的原因，自然比李富孫高明得多。其次，李富孫有過信異文的傾向，於異文多言“通”。如《左傳·隱公三年》“又取成周之禾”，李富孫曰：“《詩·兔置（引者按：置當作爰）》疏引作‘之粟’。案，禾以連槧本而言，粟，穀實也。時值秋獲，當取其禾，言粟，亦可通。”^{[16][頁5]}按：杜預注曰：“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清代以來，學者們雖已普遍認為《左傳》傳文多用夏正，但漢唐學者們恐怕還沒有這種認識，孔穎達也不太可能以粟解禾，《毛詩正義》此文恐有訛誤。再次，李富孫收集的《春秋》經傳異文仍然很不全面。於類書多隨意引用，而不是全面調查；於經史注

疏中引到的異文也遺漏頗多。

清代還有些學者對專書的引經做過研究，其中以《說文解字》引經研究最多，有吳玉搢《說文引經考》、邵瑛《說文解字群經正字》、程際盛《說文引經考》、吳雲蒸《說文引經異字》、承培元《說文引經證例》、高翔麟《說文經典異字釋》、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雷浚《說文引經例辨》、陳瑒《說文引經考證》、楊廷端《說文經斟》等。其他作專書引經研究的，還有繆祐孫《漢書引經異文錄證》、皮錫瑞《漢碑引經考》。這些都對各書中的《春秋》經傳引文作了一些研究，主要以輯錄和考證異文為主。

近代以來出現了不少關於《春秋》經傳的注釋、校勘的著作。王叔岷《左傳考校》對阮元《校勘記》、王引之《經義述聞》等多有補正，所依據的材料除金澤文庫本、敦煌卷子本《左傳》外，即以王氏蒐集的古書中引用《左傳》的異文為主。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也頗有利用文獻中關於《左傳》的引文來校勘、注釋之處。吳靜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繼承了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的方法，對於文獻中引用《左傳》的佚注、佚說做了一些收集整理。南京師範大學蘇芃的碩士學位論文《讀〈左〉脞錄》^①採用傳統的札記式的寫作方法，對《文選》李善注、《原本玉篇殘卷》中引《左傳》的內容進行了一些研究。

近代以來的學者更有專就文獻中《春秋》經傳引文進行研究者。劉師培嘗擬作《〈史記〉述〈左傳〉考》，現僅於《左龔集》中存其《自序》，《自序》稱：“師培治《左氏》久，因依傳文之序，取《史記》述傳文者，條比其文，排次衆說，成《〈史記〉述〈左傳〉考》若干卷，以存西漢古文之說。”^{[97][頁1219]}可見劉氏作此書的目的，是存《左傳》古說，與清代僅研究異文者已不同。繼起者有劉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周秦諸子述左傳考》、《兩漢諸子述左傳考》。其中《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一書筆者未見。劉氏於《周秦諸子述左傳考·自序》中稱：“《左傳》為春秋信史，絕無可疑；在其刊布之前，飽學之士，或親睹史策，或飽飫舊聞，奚異乎攬誦左氏之新編也？今旁搜遠紹，集《論語》以下諸子而述之，蓋亦前修所謂‘子可證經’之餘緒，焉得謂之誣也。雖然，諸子之說古也，非無所事：或取前賢一言，演為一說；或援古代一事，證成一誼；是則本

① 蘇芃：《讀〈左〉脞錄》，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編採輯諸子述傳文者二百餘條，即是諸子有二百餘誼本諸春秋卿大夫之言行矣。茲編約略言之，佗日余當審爲董理，以證《左傳》爲百家思想之淵海也。”^{[195][序頁5]}可見劉正浩此三書的目的也都是證《左傳》經義，存《左傳》古說。

近年來，對專書引書進行研究的論著較多，與《春秋》經傳有關的，如葉程義《禮記正義引書考》^①、周玲《宋本〈玉篇〉引十三經注疏異文整理》^②、楊思範《慧琳音義引經研究》^③、李玲玲《初學記引經研究》^④、郜同麟《〈春秋左傳正義〉引經研究》^⑤、鄭穎《〈白虎通〉引經釋例》^⑥等。這些論著一般都以異文研究爲主，旁及一些引書體例和輯佚方面的研究。另外，龍文玲《〈鹽鐵論〉引書用書蠡測》^⑦對《鹽鐵論》引書所涉及的一些學術文化及文學問題進行了分析，與上述論著的研究角度稍有不同。

日本也有個別學者對文獻引《春秋》經傳的問題進行過一些研究，如藤川熊一郎《韓非子所傳春秋經考》^⑧對《韓非子》所引《春秋》說的性質、特點和系統做了研究，並分條做了考證；吉本道雅《史記述春秋經傳小考》^⑨對《史記》引《春秋》經傳的特點做了一些研究，並對《史記》引《春秋》經傳的條目做了輯錄。

以上所引述到的各家著作，總體上看有兩個特點：一、以異文研究爲主，旁及《春秋》義理和學術文化史的研究；二、以《春秋》經傳爲研究本體，研究的目的是證經、校經。

第二節 研究對象和研究意義

本書上節中已指出，前人對《春秋》經傳引文的研究大多以《春秋》

① 葉程義：《禮記正義引書考》，（臺北）義聲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周玲：《宋本〈玉篇〉引十三經注疏異文整理》，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③ 楊思範：《慧琳音義引經研究》，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④ 李玲玲：《初學記引經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⑤ 郜同麟：《〈春秋左傳正義〉引經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⑥ 鄭穎：《〈白虎通〉引經釋例》，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⑦ 龍文玲：《〈鹽鐵論〉引書用書蠡測》，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1期。

⑧ 藤川熊一郎：《韓非子所傳春秋經考》，分載於《東洋文化》1935年第一百二十六號、1936年第一百二十七號和1936年第一百二十八號。

⑨ 吉本道雅：《史記述春秋經傳小考》，載《史林》第71卷第6號。

經傳為研究本體，而引文本身的意義却少有人關注。由於儒學是古代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關係着中國古代士人的信仰，所以清儒對《春秋》經傳的研究有維護經書純潔性的目的，用來校勘的《春秋》經傳引文自然只是經書的維護工具而已。但近代以來，儒學逐步退出意識形態領域，《春秋》經傳也不再有之前的神聖性，以前作為工具的《春秋》經傳引文本身也可以成為研究對象。本書即以這些引文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所體現出的文獻學規律、學術思想嬗變和語言文字變遷。

本書研究的第一步便是對文獻中引用《春秋》經傳內容的蒐輯。如上節所引萬希槐《十三經證異》的例言中所說，宋代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使古書版本趨於固定，因此宋以後文獻中引文的文獻學、語言學價值相對較小。故而本書以宋為斷限，對之前文獻中的《春秋》三傳引文進行全面整理研究。另外，宋初所編的幾部書，如《太平御覽》、《論語注疏》、《爾雅注疏》等皆前有所承，其主體仍為宋代之前的文獻，故而本書也將其列入研究範圍。本書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

1. 古注疏

古注疏中引用《春秋》經傳的條目極多。古代經師歷來重視溝通各經之間的關係，所以在疏釋一經時往往遍引群經，其中也大量引用《春秋》經傳。《春秋》經傳作為與歷史有關的經典，也經常作為典故被文學、史學作品徵引，這些作品的注疏在注明出典時也會大量引用《春秋》經傳的原文。另外，《春秋》經傳中所包含的名物、史地等方面的材料極為豐富，注家也往往引用《春秋》經傳的內容作為佐證。

2. 類書

類書作為引文的淵藪，《春秋》經傳中的語句同樣也被大量引用，這些引文往往具有很大的校勘價值。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即稱：“古類書不特所引佚文足資考證，即見存諸書，亦可訂正文字異同。”^{[132][頁189]}類書中所引《春秋》經傳的內容也有訂補今本的價值，清人對此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另外，類書引書多有改動，這些改動在語言研究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價值。

3. 小學類

古代字書、韻書、音義等小學類書除列出字音、字義外，還往往引書以作例證，其中所引《春秋》經傳的內容也有不少。這些材料既有助於校勘，其所釋字義又對《春秋》經傳的解讀有一定幫助。但需注意的是，小

學類書經常以所釋字破讀引文。

4. 諸子

諸子中直接引用《春秋》經傳的內容不是太多，但多引春秋史實，其中多有可與《春秋》經傳對勘者。諸子對春秋歷史的評價同樣可以作為研究早期《春秋》學的重要資料。另外，諸子中的個別語句也與《春秋》經傳有相近之處，可相對勘。

5. 史傳

史傳所引《春秋》經傳主要集中在詔令、奏諫及贊語中，其數量并不是太多，但對了解各個時期普通知識分子對於《春秋》的理解有重大的價值。

6. 其他

除前面所舉的幾類書外，其他一些文獻，如《開元占經》等卜筮書，《唐律疏議》等法律文獻中都引用《春秋》經傳以作證明或依據。這些文獻的引文同樣有着相當的校勘學、語言學和學術史方面的意義。

本書的研究意義主要在文獻學、學術思想史和語言文字學三個方面。

1. 文獻學

《春秋》引文研究在文獻學方面的意義，首先在引書體例的總結上。歷來研究引文的學者都注重引書體例的研究，如王引之、俞樾等都有零星的總結，但這種總結都不成系統，也很不全面。所以仍有許多古籍整理者、研究者因不知古書的引書體例而誤（具體例證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本書則整理出比較全面的文獻引用《春秋》經傳注的體例，對古籍整理有一定的幫助。

其次，本書還總結了一些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當前學術界已有不少關於校勘學的理論著作，但這些著作中所提出的校勘方法大多是由傳統的經史校勘中總結出來的，並不能完全適應普通古籍的校勘。本書所涉及的部分研究對象，如《太平御覽》、《原本玉篇殘卷》等，都屬於校勘質量比較差的古籍。利用對這些古籍中《春秋》引文的校勘，可以總結出一些普通古籍的失誤原因，這對一般古籍的整理工作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最後，《春秋》經傳雖經過歷代學者的校勘，其中仍有部分問題沒有解決。通過對文獻中《春秋》經傳引文的研究，可以校正今本《春秋》經傳中的多處訛誤，並提供一些不見於《經典釋文》、《春秋正義》等書

中的《春秋》經傳異文。另外，歷代校勘家所關注的主要是《春秋》經傳的校勘，不太重視各傳的古注。通過對《春秋》注引文的研究，也可以為三傳之注提供一些校勘意見。

另外，不少文獻近年來都有整理本、精校本出版，但這些文獻中的引文標點、校勘都還有不少問題。將這些文獻中關於《春秋》經傳注的引文與今本校勘，也可以改善這些文獻的整理質量。

2. 學術文化史

傳統對於《春秋》學史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一些《春秋》學著作的解讀，但一些重要的《春秋》學家的著作現已亡佚不存，對他們的相關研究也就相對缺乏，而他們著作中引述《春秋》的相關內容也就顯得彌足珍貴。如劉歆作為《左傳》學的一位大師，其著作今已不見，而《漢書·律曆志》、《漢書·五行志》中就保留了一些劉歆的《春秋》學說，這正是研究劉歆《春秋》學的重要材料。

傳統《春秋》學對於《春秋》學自身發展脈絡、《春秋》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都少有研究。通過文獻中保留的零星的《春秋》學材料，正可以勾勒出《春秋》學的發展軌迹。

前人對“《春秋》大義”的研究，一般都以《公羊傳》為本體，以研究“《春秋》大義”的具體含義為目的，對於歷代如何運用“《春秋》大義”則少有措意。通過對文獻中關於《春秋》經傳內容的考察，也可以看出歷代學者、政治家對“《春秋》大義”的具體使用情況。

另外，《春秋》學史不僅僅是《春秋》學家的《春秋》學史。作為“六經”之一的《春秋》對普通知識分子乃至普通人的思想及生活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敦煌寫本伯3813號背《判文》：“長安婦女阿劉新婦趙產子，劉往看，未到，聞啼聲，乃却回，‘此豺狼之聲，若不死，必滅吾族’。趙聞之，遂不舉。鄰人告言，勘當得實。尉判趙當罪，丞斷歸罪於劉，縣令判劉、趙俱免。三見不定，更請覆斷。”這是敦煌一件普通的法律文書，其中所記錄的事件與《左傳》中越椒、楊食我出生之事如出一轍，由此可見三傳對普通民衆影響之大。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明顯不足。

3. 語言文字學

古人在引用文獻時，往往採用同義詞替換、語句整體改造、節引、意引等方式改造原文，這對常用詞、語法演變的研究有一定意義。另外，通

過對古人引書時所更換的同義詞、引文上下語境、引書者對引文的解釋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當時訓詁學的發展，還可對三傳中一些較難解釋的字句給出比較合理的解釋。再者，古人引書中一些因形近而誤的異文也可以為文字演變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對古籍中與《左傳》相關的人名、地名異文的音韻分析也可以為音韻學研究提供資料。

第二章

宋前文獻引《春秋》綜合研究

第一節 相關文獻叙錄

本節列出了本書用來收集《春秋》引文的主要文獻，并對各書與《春秋》經傳的關係及各書中引用《春秋》經傳注的大致情況做了簡單的介紹。

《尚書正義》，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尚書》偽孔傳晚出，其注釋體例與鄭玄等漢代注家不同。故雖《尚書》內容多與《春秋》相合，但偽孔傳中并未有稱引《春秋》經傳之處。《尚書正義》為唐初孔穎達主編的《五經正義》之一。《尚書正義·序》稱先代《尚書》疏“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128][頁110]}，則此書蓋據二劉之書而作。該書與各經注疏體例相近，都引證詳博，共引《春秋》經傳三百餘條，但異文不多。本書所用《十三經注疏》皆以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為主，并參考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校勘成果。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詩經》中部分篇目作於春秋時期，其小序多有可與《左傳》對照之處。《左傳》中引《詩》較多，間或對《詩》義進行闡發。《詩》毛傳可能吸收了部分《左傳》中的《詩經》釋義（如《小雅·皇皇者華》毛傳與《左傳·襄公四年》部分文字相近），而《左傳》杜預注也引用了一些毛傳的內容，這些都可以用來校勘。如《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杜預注“爰長而無刃”，《詩經·衛風·伯兮》傳作“爰長丈二而無刃”^{[128][頁527]}，與宋本